

曹魏代汉后的正统化运作

——兼论汉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响

朱子彦 王光乾

内容提要：由于眷恋汉室思潮的存在，以及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曹氏在假“禅让”之式移运汉鼎之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对曹魏王朝进行合法化、正统化运作。曹丕、曹睿父子，竭力摹仿尧舜禅让，通过礼遇汉献帝及其后妃，笼络汉之元老耆宿，更易正朔、服色，逐步确立“魏家舜后说”，并对郊祀礼制加以改革，从而对曹魏的正统化地位进行了确认和完善。

关键词：曹魏代汉 正朔 服色改易 魏家舜后说 正统化

从表象上看，曹丕受禅似乎标志着汉魏鼎革业已完成，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① 曹丕受禅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初步定型，魏虽然比吴、蜀强大，却并无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汉献帝虽然被赶下了政治舞台，但汉朝影响犹在，曹氏宗亲、曹魏大臣及普通民众中仍有部分人眷恋汉室。曹丕虽宣称大魏受命乃是法尧禅舜，理应四海同庆、万众归心，然对魏政权合法、正统与否，依然心怀疑虑，忐忑不安。曹丕受禅时，对公卿诸将的政治表态显得极为敏感。曹丕践祚后，征羌护军郭淮奉命来

① 现有的有关汉魏禅代的少量研究成果，视野主要集中于曹操时期。或剖析军（霸）府建置及其功能的转变，以讨论曹操经营禅代的政治手腕（如于涛《汉魏禅代的“军府”模式及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或着眼于九锡制度的授受时机与汉魏禅代的步骤和进程（如朱子彦《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或以剖析求才令来阐述曹操为禅代作思想铺垫（如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这些研究皆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受切入角度的限定，只能展现汉魏禅代之一斑。笔者认为，汉魏禅代是一个连续、动态、多维的政治工程。曹操时期仅是滥觞阶段，有关曹魏代汉后的合法化、正统化运作，如曹魏对汉室的政治礼遇，“魏祖虞舜说”的确立，郊祀礼制变革，正朔、服色改易等关键问题，目前均付诸阙如，无人涉足。

贺^①，因途中患疾，未能及时赶到，曹丕则认为郭淮眷恋汉朝，心怀反侧，遂厉声斥责郭淮：“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郭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于防风之诛也。”^②亏得郭淮能言善辩，应对机敏，才躲过了一劫。

史实证明曹丕的担心绝非多余。曹魏心腹重臣中亦有人对曹魏代汉狐疑满腹。在曹丕受禅仪式上，相国华歆、尚书令陈群面有不怡之色，使曹丕心中久久不悦。仪式结束后，“朝臣三公已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徒，而不进爵”^③。后曹丕问陈群：“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④刘晔系光武帝子阜陵王刘延后裔，兼为曹氏重臣，身份特殊，他在汉魏禅代完成之后，惟恐遭主上猜忌或被人利用，故以“略不交接时人”为处世保身之道。有人问及原因，刘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⑤刘晔所说的“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一语，透露出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即曹魏代汉的合法性虽得到了少数“智者”的首肯，但并未被广大民众所认同。

刘晔之论洞若观火，汉代遗民中对曹魏代汉存有抵触情绪者，更不鲜见。隐者焦先“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⑥，以自己怪异的行止表达了对曹魏代汉的反对和愤懑。

更为明显的是，蜀章武六年（226），诸葛亮首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⑦。其实，诸葛亮的大军还在北伐的路途之中，南安、天水、安定的军民就望风归降，蜀军兵不血刃便得三郡，可见其“兴复汉室”的政治宣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人心思汉”的表现十分明显。虽然曹魏后来对降蜀吏民进行了严酷的报复，“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吏民）皆坐应亮破灭，两郡守各获重刑”^⑧。但是这种“人心思汉”的政治局面，不能不引起曹魏朝廷的反省和深思。

① 据《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载“文帝为五官将，召（郭）淮署为门下贼曹，转为丞相兵曹议令史”，淮后随曹操、夏侯渊征讨汉中，立有战功，“太祖善之……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转为镇西长史，又行征羌护军”，可见郭淮深得曹操、曹丕父子信任。

② 《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

③ 《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序》。

④ 《世说新语》卷中《方正第五》。孙权曾对以陈群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对曹魏政权的离心倾向作过精辟分析。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权曰：“长文（陈群之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笞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

⑤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晔传》。

⑥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附胡昭传》注引《高士传》。

⑦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⑧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

曹丕代汉之举，不仅敌国不会认同，甚至连曹氏家族内部亦有人坚决反对，《后汉书》卷一〇《献穆曹皇后纪》载“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不能仰视。”可见，曹丕之妹曹皇后是坚决反对其兄代汉的。

曹魏虽居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禅代后一直标榜己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但其对自己是否是天下正统之所在，以及日后能否统一天下，并无十分把握。如孙权曾以郎中令陈化出使曹魏，曹丕设宴款待。席间，“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①又如，蜀将黄权降魏，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②

另外，曹丕受禅后，不仅吴蜀侧目，声讨曹丕篡汉的罪行，甚至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亦不认同曹魏是天下正朔之所在。如刘备新丧，南中大姓雍闿即恣睢于永昌，“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③雍闿桀傲狂妄，既不认同蜀汉是正统，亦不承认曹魏是天下唯一的正朔，公然降吴。辽东公孙渊叛魏联吴，在其上孙权的表章中，称自己“犹知符命未有攸归”，言外之意竟然是贬魏尊吴，并祝孙权能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④。

对此状况，曹魏岂能熟视无睹，为了收拾人心，使汉魏禅代更显真实，并在三个政权中建立天朝上国的宗主地位，曹魏必然有强烈的合法化、正统化诉求，要求曹丕及其后继者去积极地运作。

二

（一）“永为虞宾”：曹魏对汉室的政治礼遇

汉魏更祚、君臣易位后，对汉献帝及其后妃的处理、安置，既是易代鼎革的后续措施，亦关系到禅代成果的巩固和新生政权的稳定。为使禅让更符合尧舜自愿授受的高义，在“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时，“（卫）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

①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

② 《三国志》卷四三《蜀书·黄权传》注引《蜀记》。

③ 《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吕凯传》。

④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附公孙渊传》注引《吴书》。

帝数日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①曹丕明确表示要与退位的汉献帝共享天下之珍,也就是说对待汉献帝必须效法舜对丹朱、禹待商均一样,极尽宾礼。

献帝逊位后,曹丕下诏:“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②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③。由此可知,汉献帝逊位后,虽仅居公爵,但待遇却高于诸侯王,特别是仍具有祭天之权。从中国古代“天命论”的思想考量,皇帝乃上天之子,祭天是皇帝的专权。曹丕赋予汉献帝祭天的权力,就是认同汉献帝仍然拥有天子的政治象征地位。

因汉代皇后、公主有汤沐邑、食邑,故曹丕循此故事,于黄初四年(223)十二月,“赐山阳公夫人汤沐邑,公女曼为常乐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户”^④。至于汉献帝及其子孙还得到了哪些具体的礼遇,由于史籍语焉不详,难以获得整体的把握,但或可从晋朝对陈留王(曹奂后代)的态度中窥斑知豹。晋元帝司马睿时,“将缮宫城,尚书符下陈留王,使出城夫。(荀)奕驳曰:‘昔虞宾在位,《书》称其美;《诗》咏《有客》^⑤,载在《雅》、《颂》。今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右,故答表曰书,赐物曰与。此古今之所崇,体国之高义也。谓宜除夫役。’诏从之。”^⑥清人杨晨据此条史料判断“晋与陈留如是,魏与山阳宜同”^⑦,认为踵袭汉魏故事的晋王朝对待陈留王,当与曹魏待山阳公略同。

汉献帝禅位后,就表明他与曹丕已是君臣易位,从昔日的九五之尊降为国公。那么,在献帝死后又如何重新确认其身份地位呢?这是一个颇为棘手之事。魏明帝曹睿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示出其是一个相当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他坚持贯彻其父制定的禅代之礼,并进一步加以完善。青龙二年(234)三月,“山阳公薨”,“帝变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节行司徒太常和洽吊祭,又使持节行大司空大司农崔林监护丧事”,及至发丧之日,“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仪礼,一如汉氏故事”。“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葬之日,帝制锡衰弁絰,哭之恸”^⑧。汉献帝

①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卫臻传》。

②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③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④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

⑤ 《有客》篇载《诗经·周颂》,《毛诗》序曰:“《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即《有客》是宋微子朝周,周王设宴饯行时所唱的乐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即微子为殷后,于周为二王后。因殷人尚白,故来朝做客亦乘白马。

⑥ 《晋书》卷三九《荀勖传附荀奕传》。

⑦ [清]杨晨:《三国会要》卷一二《宾礼》。

⑧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生前虽不得志，死后可谓极尽哀荣。

葬礼之所以如此隆重，主要是因为曹睿要借汉献帝之丧，发挥“禅代之义”，使汉魏易祚是基于禅让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强化，其重要性不亚于当初曹丕导演的“禅让仪式”。献帝死后，曹睿“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庙”^①，文曰：

睿闻夫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亲亲，咸有尚焉。今山阳公寝疾弃国，有司建言丧纪之礼视诸侯王。睿惟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深观历数允在圣躬，传祚禅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黄初受终，命公于国行汉正朔，郊天祀祖礼乐制度率乃汉旧，斯亦舜、禹明堂之义也。上考遂初，皇极攸建，允熙克让，莫朗于兹。盖子以继志嗣训为孝，臣以配命叙述为忠……睿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灵。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丧葬所供群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②

在这段文字中，曹睿表达自己的两层政治用意：第一，曹睿从“子以继志嗣训为孝，臣以配命叙述为忠”的伦理入手，强调在对待汉献帝的态度上，自己要“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灵”。所以尽管汉献帝死时爵位为山阳公，并且“有司建言丧纪之礼视诸侯王”，曹睿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不是“古之遗制”，更不符合“先帝之至意”^③，遂将汉献帝的丧礼一同帝王之制。第二，表彰汉献帝刘协“传祚禅位，尊我民主（即尊魏为万民之主）”，其功无上，足可追踪唐尧。所以须以帝王规格，隆重地厚葬汉献帝。

另外，在为山阳公刘协加谥号的问题上，魏明帝曹睿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谥刘协为“孝献皇帝”。何以要以“孝献”二字作为其谥号？细加考察，发现其中寓意深刻。加“孝”字，是因为两汉崇尚孝道，故两汉诸帝，除高祖和光武帝外，谥号中均例加一“孝”字。而“献”字又作何解释呢？据《逸周书》卷六《谥法解》的标准，只有“聪明睿哲”才能称之为“献”。

刘协一生先为董卓、李傕、郭汜所困，颠沛流离于长安、洛阳间；后又被曹操羁于许昌，最终被囚于山阳国，以终其年。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其“聪明睿哲”究竟体现在何处？考诸史籍，笔者发现，董卓之所以废少帝而立刘协，原因就是少帝时即机智灵敏。史载，董卓“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即刘协）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④。然而，这最多只能

①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②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③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④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说明他在智力上优于其兄，比较聪明罢了。“睿哲”又由何而来？笔者以为，明帝对刘协加此美谥，并非着眼于刘协的智能。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刘协能在“尺土一民，皆非汉有”^①，自己又回天乏术的情况下，较为理智和顺从地将帝位“禅让”于魏。正如明帝谥山阳公为孝献皇帝诏中所言：

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②

不难看出，魏明帝曹睿是位政治高手，他表面上表彰刘协“聪明睿哲”，谥之曰“献”，甚至将其比作尧、舜那样的大圣，能够“深识天禄永终之运”。而实际上却把诏书最终的落脚点放在彰显曹魏之天下源于汉禅上，以证明汉魏政权的权力交接是合情、合理、合法，无需争议的。民国学者李澄宇论此事曰：“（曹睿）追谥山阳公为孝献皇帝，葬以汉礼”，乃是因为“远念旧君”^③。对其颇为赞赏，显然是为曹睿的政治手腕所惑，并未看穿曹睿政治上的良苦用心。

山阳公夫人死后，曹魏亦以皇后之礼厚葬之。景元元年（260），“故汉献帝夫人节薨，帝（曹奂）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④。虽然曹节系曹睿、曹奂的长辈，厚葬亦理所当然，但他们所强调的是她另外的身份——“汉献帝夫人”、“献穆皇后”。显然这种身份是汉朝的象征，对她礼遇即表示对汉朝禅天下于大魏之功德的表彰，同时也可进一步为曹魏政权的合法化、正统化层层加码。

总之，曹丕、曹睿父子如此礼遇汉朝逊帝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即削减汉皇族、遗民对新政权的敌意，如此，则更符合禅让的仁德标准，更能掩盖曹丕篡夺刘家天下的实质。曹魏政权不仅要为汉献帝及其后妃优遇有加，而且还要为汉朝历代的贤君明主予以崇祀。如黄初二年春正月，曹丕“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祀汉世祖”^⑤。并派专人守护汉朝先祖坟茔，颁布《为汉帝置守冢诏》：“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⑥景初二年（238），曹睿获悉汉高祖和光武帝的陵园被损毁，乃宣布禁令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③ 李澄宇：《读三国志蠡述》卷一《书明纪》，载《读二十五史蠡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④ 《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奂纪》。

⑤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⑥ 《太平御览》卷五六〇《文帝集》。

采。”^①可见，曹魏对汉朝的宾礼是多元的、立体的。曹操没有完成的代汉之大业，在曹丕的苦心经营下，最终得以实现。在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曹丕、曹睿父子采取了宽容善待的策略，令拥汉派难以置喙，表现出高超的政治谋略。明方孝孺在《武王伐纣》一文中论道：“汉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圣智之度，高祖犹能不杀子婴，文帝犹能奉山阳终其身。曾谓武王圣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其不然矣。”^②从优待汉献帝一事来说，方孝孺认为曹丕做得比周武王这样的圣君还要好。

（二）笼络当世耆宿 散播禅代之义

欲使天下万姓认可一个新生王朝，首先必须得到耆宿名士，即世家大族代表人物的支持和拥戴。汉魏禅代之后，曹丕除了在国内普通民众中进行收拾人心的工作外，更主要的是积极拉拢和优待在当时社会上具有极大影响的精英人士，其中以对杨彪、管宁、许靖三人的态度最具代表性。

杨彪出身于世宦大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③，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故曹丕践祚之后，对其极尽笼络之能事，企图使故汉太尉杨彪仕魏，以论证汉魏禅代的合法性。然而“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④杨彪有着浓厚的眷汉情结，对曹魏有较明显的抵触情绪。虽曹丕不加以高位，以太尉之职相授，彪仍不为所动，弦外之音无非是“耻为魏臣”，贵为天子的曹丕竟然碰壁，心中不悦，但碍于杨彪的高名盛誉，曹丕一时也无可奈何，只能“不夺其意”，并依旧对其敬重有加。他下诏曰：“公故汉宰臣，乃祖已来，世著名节。年过七十，行不逾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彰旧德。其赐公延年杖及冯几，谒请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⑤

黄初四年（223），曹丕再次“诏拜（彪）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尽管彪仍“上章固让”，但曹丕执意为之，不但加以“光禄大夫”之位，还大张旗鼓地在杨家门前设置行马，安排吏卒，“以优崇之”^⑥。曹丕如此厚待杨彪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冀图化解汉朝元老大臣对曹魏政权的敌意，尽可能让他们与新政权合

①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②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

③ 《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彪传》。杨震官太尉，其子秉，代刘矩为太尉。秉子赐，代刘郃为司徒，又代张温为司空。赐子彪，代董卓为司空，又代黄琬为司徒，代淳于嘉为司空，代朱儁为太尉录尚书事。自震至彪凡四世，皆为三公。

④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续汉书》。

⑤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

⑥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续汉书》。

作。明复社领袖张溥称赞曹丕此举曰：“霸朝初创，力更旧辙，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①

无独有偶，曹氏笼络管宁亦不遗余力。管宁，北海朱虚人，少知名，与华歆、邴原相友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②。后歆、原皆事曹操，由汉入魏，得居高位。管宁在野，专心学问，砥砺道德，声名反高于二人。管宁避乱辽东时，公孙度“虚馆以候之”；曹操为司空，千里“辟宁”，“（公孙）度子康绝命不宣”，与操争夺管宁。可见管宁在当时颇受推崇。“文帝即位，征宁”，并“诏以宁为太中大夫”，宁虽因此回归中原，但对曹丕的册封“固辞不受”；逮明帝登基，“太尉华歆逊位让宁”，司空陈群荐宁。宁虽不应命，但曹睿不厌其烦，依旧“征命相仍”，礼遇日隆，“常以八月赐牛酒”。对宁殷勤如此，其用意同曹丕极力笼络杨彪如出一辙。正如明帝征管宁诏中所道：“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则襁负而至，斯盖应龙潜升之道，圣贤用舍之义”，把管宁描述成一个对“大魏受命”欢欣鼓舞之人。

管宁虽志在林泉，始终不肯出仕，然在答辞中却对曹魏皇帝歌功颂德：“横蒙陛下纂承洪绪，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泽，积祀一纪，不能仰答陛下恩养之福。”管宁的表态完全符合曹魏皇帝藉名士耆旧之口，颂扬曹魏王朝“德侔三皇，化溢有唐”的政治需要。虽然宁终未为魏所用，但其子管邈却被拜为“郎中，后为博士”^③。

许靖字文休，“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是主持汝南月旦评的核心人物之一^④。许靖不仅在品评人物方面为世人所重，在裁量时政方面亦堪称权威。所以，宋忠与蜀郡太守王商书，特称“文休倜傥瑰伟，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⑤，将许靖之言行奉为士人之范式、圭臬。刘备称王、称帝无不借重许靖之名，也是对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在举刘备为汉中王表中，许靖列名第二；在劝刘备称尊号表中，则列名第一。^⑥刘备之亲信、肱股，文如诸葛亮、法正，武如关羽、张飞，均列名于其后。靖七旬高龄之后，仍然“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

① 张溥辑《魏文帝集·题辞》。

② 《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魏略》。

③ 据《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

④ 关于许靖同月旦评的关系，可参阅朱子彦、李迅《论东汉末年汝南郡的月旦评》，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

⑤ 《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

⑥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田余庆先生在其《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溯源》第一节《关于举刘备为汉中王〈上汉帝表〉》中，从蜀汉集团内部新旧、客主派系之分的角度，对举刘备为汉中王的《上汉帝表》中马超、许靖为何排在诸葛亮之前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供参考。见《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相诸葛亮皆为之拜”^①，可见其社会影响力之大。

许靖居中原时，交游颇广，“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子群，魏初为公辅大臣”，承曹丕之命，“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②。其实华歆、王朗、陈群等人绝非单纯地要与许靖“申陈旧好”，而是通过笼络许靖，来扩大汉魏禅代的影响。其中以王朗致许靖的三通书信最为典型。

王朗首先通过“展叙旧情”，与许靖拉近关系。继而对其大加赞誉，说曹操在日，已对您“拳拳饥渴”；曹丕“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隽之见在者”，亦言必推重您许靖。其次，绘声绘色地描绘汉魏禅代，云自己“于老耄之齿，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会，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燿燿焜耀之青烟；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也”。把汉魏禅代说得美妙无比，简直就是尧舜禅让的翻版。并声称“子虽在裔土，想亦极目而回望，侧耳而遐听，延颈而鹤立也”。这样的描述，除欲说服许靖相信汉魏易代合法、曹丕是有德圣君之外，还欲通过许靖之口宣传曹魏的正统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企图让许靖在刘备新丧之际，“定（蜀）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帝号），事受命之大魏”。若能如此，足下之功“足以超越伊、吕矣”^③。

其实，许靖在蜀，虽地位尊崇，但所任太傅、司徒等均为虚职，他没有也不可能左右蜀汉政权的能力。刘备和诸葛亮早已将蜀汉政权包装成汉朝的延续。许靖即使信服王朗所说，认为曹魏是正统所在，汉魏禅代合法，估计亦不敢漏言。况且靖在蜀汉章武二年（222）刘备逝世不久即死去。王朗致许靖第三通书信，系刘备逝世之后写给许靖的。退一步讲，许靖即使有心做曹丕、王朗的喉舌，在时间上也是不允许的。曹丕君臣的苦心经营，最终未收其功。

（三）“纳汉二女”：曹丕对尧舜禅让的刻意模仿

曹丕在禅汉之时，为求其真，刻意模仿典籍所载的尧舜故事。这集中地体现在曹丕娶汉献帝二女^④一事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已“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⑤。当然汉献帝嫁给曹丕的两个女儿，不可能是曹氏姐妹之女。尽管如此，丕与献帝二女系两辈人，他们之间近乎甥舅关系，丕娶献帝二女毕竟有乱伦之嫌。历代史家在论及此事时，皆指斥曹丕不守礼法，好色耽乐。如东晋史学家孙

① 据《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

② 《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许靖与王朗关系甚洽，靖得罪于董卓，惧见诛，避祸江东，得王朗护佑。大概正因为这层关系，曹丕才多次申敕王朗致书许靖。

③ 按：王朗与许靖书三通载于《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注引《魏略》。

④ 献帝嫁曹丕二女，其名、位均失载。惟《三国志》卷五《魏书·文昭甄皇后传》中说：“（曹丕）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可见献帝二女也一度得曹丕宠幸，甚至危及甄皇后的地位。

⑤ 《后汉书》卷一〇下《献穆曹皇后纪》。

盛认为：曹丕在其父殂逝之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①又如清人王昶曰：“（曹丕）自比妣汭，纳汉二女，丰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恶于无穷也。”^②

笔者以为，孙、王二人所论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然曹丕在谅闇之中曾遣使至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③等玩好之物。其后又“悉取武帝宫人以自侍”^④。越礼之行、好色之性，确有其事。但娶献帝二女却有更深的政治含意，不可以常理度之。那就是尧在禅位于舜之前，亦嫁之以二女，即传说中的娥皇、女英^⑤，曹丕娶献帝二女正是踵此故事，乃是要把汉魏“禅让”演得更逼真、更圆满。换言之，“归二女”是“禅帝位”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⑥，与曹丕的个人品质并无直接关系。另外，此事在汉献帝的禅位诏书中也有体现，诏书称“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绍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嫔于魏”^⑦。其中“釐降二女，以嫔于魏”一语，是从《尚书·尧典》中的“釐降二女于妣汭，嫔于虞”^⑧沿借而来。可见曹丕为将“禅让”演得尽可能逼真，连献帝禅位诏的细微措辞^⑨，都悉数考虑在内，真可谓用心良苦。

但汉魏鼎革确非真正的禅让，曹丕毕竟害怕民间的议论和后世的评说。为此他勒石铸鼎，企图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曹丕令人将《受禅表》及《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刊之于石^⑩，并铸受禅鼎，其文曰：“受祚鼎”^⑪。

①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孙盛曰。

② [清]王昶：《金石粹编》卷二三《上尊号碑》附王昶论。

③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④ 《世说新语》卷下《贤媛第十九》“魏武帝崩”条载：“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

⑤ 顾颉刚、刘起釭二先生在《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5页）中考证“娥皇”、“女英”时说：二女的名字，《尧典》和《史记》里都没有。注疏家根据神话遗存下来的材料证明是娥皇、女英（《孔疏》始据《列女传》，《蔡传》继之。马、郑及伪孔犹未及注）。神话书《山海经》中，上帝“帝俊”的妻子有娥皇、羲和、常羲（常仪）。

⑥ 据《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奏曰：“汉朝虽承季末陵迟之余，犹务奉天命以则尧之道，是以愿禅帝位而归二女。”

⑦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乙卯，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

⑧ 引文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⑨ 汉献帝逊位前，已完全掌控于曹丕手中，故禅位诏不可能由其本人所撰，推测当由曹魏重臣在曹丕授意下书之。

⑩ 曹魏受禅时刊立的《受禅表》及《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两通碑刻统称“受禅碑”，又称“三绝碑”。两碑均系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铸字，谓之三绝，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此碑在历史上被称为汉魏鼎革的里程碑，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存于位于许昌市西南17公里处的繁城镇汉献帝庙内。

⑪ 《四库全书》卷一一五《子部》九《谱录类·鼎录》。

受禅台是曹丕告天受禅之所^①，对于曹魏政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汉魏皇权交接合法性的标志。故太和四年（230），魏明帝行过繁昌时，“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②。裴松之按曰：“《汉纪》章帝元和三年，诏高邑县祠即位坛，五成陌，比腊祠门户。此虽前代已行故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求之义典，未详所据”^③，即裴氏认为曹氏此举于典无载、于礼无据，不应致祭受禅台。笔者以为，裴氏拘于典章礼仪，不知随时制宜，不懂得受禅台的象征意义。

安抚人心、礼遇优待前朝废帝、宗室及遗老，仅是巩固新生政权、不让旧王朝势力复辟的一方面措施，要论证汉魏禅代的合法性，使曹魏“受命于天”的思想深入人心，还必须处处以儒家经典及礼仪制度作为理论依据和指南。在这方面，曹魏君臣殚精竭虑、煞费苦心，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进行正统化的包装。

三

（一）“魏祖虞舜”：曹氏四易其祖的政治寓意

为了论证汉魏禅代是尧舜禅让的再现，曹丕、曹睿父子从“汉家尧后说”^④出发，苦心打造“魏家舜后说”。以至于从曹腾至曹睿五代之内出现了多种曹氏祖源版本。卢弼因而评曰：“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⑤笔者以为，卢氏固然学问博洽，然于此事之认识却浮于表面，既未深入，更不到位。曹氏因政治需要，改易祖先之所出，必有所本，必有所寓，其与汉魏禅代的奠基、实施和完善息息相关。从表象上看，此事似乎是曹氏认祖溯宗的家事，实则是曹氏进行易代更祚，巩固曹魏政权，论证其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文化工程。

卢弼所谓曹氏“三易其祖”，分别是祖汉相国曹参、祖曹叔振铎、祖舜。^⑥揆诸史籍，可发现卢氏的总结并不完全。依笔者归纳，得到曹氏及曹魏官方承认的说法可分

① 受禅台位于许昌市西南 17 公里处的繁城镇。虽经千余年风雨侵蚀，至今犹存 20 余米高、30 余米长宽的二层凸状台基。

②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③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臣松之曰。

④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祖不可考知。而《汉书》卷七五《眭弘传》载昭帝元凤三年（前 82）眭弘上疏“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卷一《高帝纪下》班固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⑤ 《三国志集解》卷一《武帝纪》卢弼“考曹氏祖条”后论。

⑥ 《三国志集解》卷一《武帝纪》卢弼“考曹氏祖条”。

为四种,较卢氏多祖颡顼一说。姑一一列之:

第一种,祖汉相国曹参。见于《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但紧接着,《武帝纪》又载:操父曹嵩系其祖父曹腾所收养,“莫能审其生出本末”^①。既然莫能审曹嵩生出之本末,何以又说曹操是汉相国曹参之后呢?显然这是陈寿的春秋笔法,寿亦不知曹嵩之前的具体世系,更不知其先之所出。所以先书曹操“汉相国参之后”以美魏,后书其父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以实录。

第二种,祖曹叔振铎。此说出自曹操及其子曹植之口。魏名臣蒋济有言:“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②另,曹操死,曹植撰《武帝诔》,称述曹操曰:“於穆武皇,胄稷胤周”^③,是后稷的子孙,周室的后裔。实际上操、植父子所述基本相同,只是曹植所说相对隐晦些。我们可通过史书所载有关曹叔振铎的资料来阐明以上所据。曹叔振铎系周文王之子,封于曹,其后人以国为姓。^④上述操、植的说法即本于此。

第三种,祖颡顼。此说萌于曹腾碑文:“曹氏族出自邾”^⑤,邾为颡顼之后。其后,《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所上劝曹丕受汉禅表,亦有言曰:“魏之氏族,出自颡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

第四种,祖舜。此说成于魏明帝曹睿时期。景初元年(237),曹睿下诏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⑥此后遂为定论,常道乡公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时,犹称“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⑦。笔者以为,祖舜说是由祖颡顼说发展而来。颡顼虽然与舜同祖于黄帝,但二者之间尚隔数世^⑧,颡顼后并不等同于舜后。最关键的是,祖颡顼并不能精确地将汉魏禅代比附于尧舜禅让。因汉家尧后说早在西汉末年已然确立,曹睿时代,汉魏政权交接已历十数载,要想使汉魏禅代得到进一步完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古今学者皆以为非实,其据有二:第一,《曹瞒传》系吴所撰,敌国之间多相诬毁;第二,夏侯惇之子楨尚清河公主,夏侯渊之子衡亦娶曹氏女,根据同姓不婚的禁忌,曹操不可能是夏侯氏一脉。

②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注引臣松之案。曹操《家传》原文已佚,清严可均《全三国文》亦仅从《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裴注中辑此一语。

③ 《全三国文》卷一九《武帝诔》。

④ 《世本》卷二《诸侯世本》“曹国”条。

⑤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注引臣松之案。

⑥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⑦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⑧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颡顼,颡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善和确认，抛出曹氏祖舜说是非常必要的。之前亦有故事可循。王莽代汉，亦曾在祖舜上大做文章。袁术僭号时亦振振有词：“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①

必须指出的是，祖曹参、祖曹叔振铎二说与祖颡顼、祖舜二说的政治寓意是完全不同的。前二者无非是抬高身价，使自身血统高贵化，摆脱“赘阉遗丑”^②的出身阴影；后二者则是出于配合汉魏禅代的政治目的的需要。为了使祖舜说显得更加真实和明确，以进一步确立汉魏禅代是尧舜禅让翻版的政治理念，曹睿在祖舜的基础上对魏郊祀礼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景初元年，曹睿下诏将汉魏禅代与曹魏的郊祀礼制联系起来：

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见经，是以制度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③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曹操）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卞氏）配。^④

该诏从汉朝“四百余年，废无禘祀”入手，表示大魏不可承此弊，必须明立禘祀。何谓禘祀之礼？《诗·商颂·长发序》：“《长发》，大禘也”，即《长发》是宋国国君祭其祖成汤时演唱的诗章。郑玄笺：“大禘，郊祭天也。”孔颖达疏：“禘者，祭天之名。”^⑤《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⑥可见所谓禘礼，系指郊天之礼，同时强调要以始祖配祭，而曹睿所要禘祭的就是他苦心附会的虞舜。所以诏书中说“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可见曹睿就是企图通过郊祀大礼将魏祖虞舜之说予以礼制化，而不是流于眩人视听的说辞。

清人王鸣盛未解此意，指斥协助曹睿进行这项工作的王肃、高堂隆道：“汉虽祖尧，而郊祀未尝及。魏乃以舜为始祖。王肃、高堂隆辈附会如此，岂不贻千古笑端乎？”^⑦其实，汉末郊尧是有缘由的，光武帝建武七年（31），“大议郊祀制，多以为

①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术传》注引《典略》。

②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③ 舜妃即传说中的娥皇、女英，曹魏不知以二者共同还是二者之一配祭方丘。娥皇、女英系尧女。《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尧，谡也。放勋，名。帝誉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张守节《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可见，尧帝本姓伊祁氏，“尧”为谡，“放勋”为名，“唐”为其政权中心，故曹睿诏称舜妃为“伊氏”。

④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⑤ 《毛诗正义》卷二〇《商颂》。

⑥ 《礼记正义》卷三四《大传》。

⑦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七《三国志》“魏祖虞舜”条。

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下公卿议”。杜林曰：“人无愚智，思仰汉德。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人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说谕。后稷近周，人户知之，又据以兴，基由其祚。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宜如旧制，以解天下之惑。”^①杜林以为，后稷之于周，世系较近，且周之兴奠基于后稷。而尧之于汉，年代久远，世系渺然无考，且汉之基业是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所创建，即所谓“基业特起”，与尧并无半点干系，故无须郊尧。杜林言之有理，为光武帝最后所采纳。而曹氏假禅让得据皇位，其时社会上尚不乏眷汉思潮，而深化祖舜说，并将其礼制化是相当明智的选择，不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心疑惑，又可在三国正僭之辨中找到有力的依据。所以王鸣盛在其论断中是汉非魏，讥讪王、高，似有武断之嫌。^②

曹睿郊祀礼制改革的核心是祖舜，但这毕竟有“横祀非族”^③之嫌，曹魏的肇创之君曹操岂可忽焉不祀。为了配合舜及其妃伊氏的乾坤二位，又以曹操正妻武宣后卞氏配地郊，即“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这样曹睿就建构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四重郊祀祖配体系：

圜丘(皇皇帝天)，以始祖帝舜配 ————— 方丘(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

天郊(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 ————— 地郊(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实线代表横向、真实的关系；虚线代表纵向、附会的关系)

图1

曹睿建构的这一独特的郊祀结构，其不同既往之处有三：

第一，打破汉郊天只以开国之君相配的格局^④，直追始祖舜（虽然是附会的）。实际上，曹魏同汉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曹操世系只能上溯至父曹嵩，祖曹腾，曾祖曹节，且腾、嵩二人尚为养父子关系。《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刘邦）父曰

① 《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注引《东观记》。

② 对明帝此举持异论者非惟王鸣盛一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〇第22条以为：“（汉）高祖起田间为亭长，自以灭秦夷项之功而有天下，征家世于若存若亡之余。悬拟一古帝为祖，将谁欺？欺天乎？自汉以下之不禘，岂不允哉”。并以此指斥曹睿：“妄自祖虞而以废禘讥汉，尤不知禘者也。”又说曹氏祖舜，同唐祖皋陶、老聃一样是“自张大”，即高贵其血统，美化其政权。虽然较王鸣盛认识较深，但亦未挖掘出曹氏祖舜这一个案的特殊性。

③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注引臣松之案：蒋济以为，“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济又曰：“夫纠龙神于獭，獭自祭其先，不祭纠龙也。骐驎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骐驎也。”均表达了对魏祖虞舜的异议。

④ 两汉不但郊天以高帝配，祭泰一、地祇等亦如此。如《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下》载“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元鼎）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又如《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载“（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太公，母曰刘媪。”其祖父名讳已经无从得知了，然而“太公”、“刘媪”又何尝是真名字？“太公”只是尊称，“刘媪”不过是“刘家老太太”的意思，尚不知其母家姓氏。^①汉末郊禘，曹魏祭天也并非一开始就以舜配祭。其中有一个从未有祖配，到以武帝配，再到以舜配的嬗变过程。兹将不同时期曹魏祭天的史料列出，以证上论：

建安二十五年（220），文帝南征，设坛于繁阳，庚午，登坛受绂，降坛视燎，成礼，未有祖配。^②

黄初二年（221）正月，郊祀天地、明堂。^③

太和元年（227）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④

明帝诏曰：“每祀天则以地配。”^⑤

景初元年（237）明帝诏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⑥

第二，把女性祖先（包括女性始祖、开国君主之后）纳入郊祀祖宗配祭体系之中。首次把开国君主之后纳入郊祀配祭体系，是王莽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提出的：“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⑦但曹睿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以舜妃伊氏配方丘（皇皇后地），以武宣后配地郊（皇地之祗），形成了两重女性祖先的配祭模式^⑧。

第三，形成了圜丘对天郊（配祭上是男性始祖对开国之君），方丘对地郊（配祭上是女性始祖对开国国君之后），这样一个纵横各有两层的四重配祭体系。

《礼记·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颡顓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颡顓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孔颖达疏：“‘有虞氏禘黄帝’者，谓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时，以黄帝配祭。‘而郊喾’者，谓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以喾配也。‘祖颡顓而宗尧’者，谓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以颡顓及尧配之，故云

① 据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第12章《汉为尧后说》，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8页。

② 《通典》卷四〇《礼二·郊天上》。

③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④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⑤ 《通典》卷四〇《礼二·郊天上》。

⑥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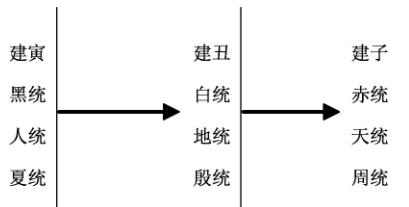
⑦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

⑧ 《全三国文》卷三一载高堂隆《后妃配郊表》：“古来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汉文初祭地于渭阳，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阴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谓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表明在以舜妃配方丘、武宣后配地郊这一点上，高堂隆也曾予以反对，主张以武皇帝曹操一人兼配天地。

祖颡顼而宗尧’。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义亦然，但所配之人当代各别。”^① 据《礼记》所载虞夏商周四代，在其男性祖先中选出四位杰出代表，特以其中前两位配祭于禘、郊之礼。笔者以为，曹睿“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即本于此。根据天地、乾坤、男女等关系，曹睿又别出心裁地构建了两重女性祖先的配祭模式。如此一来，舜与曹操，伊氏与武宣后无形中就构成了始祖与裔孙的关系，完全可以满足曹睿论证魏家舜后的政治需求。

（二）曹魏对正朔、服色及雒阳之名的改易

易代之后，相应的体制和王朝的象征物也需要随之改变。古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是“天命论”，皇帝仗天命以立威，借天命以成人事，挟天命以制臣民。而改正朔正是论证王者受天命的最重要手段。正如董仲舒所言：“王者受命，必改正朔。”^② 司马迁亦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③ 可见新朝肇建，改正朔，易服色已成成例。改正朔，主要是改“正”，也就是以何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建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④ 所谓“随寅、丑、子所建”，就是分别以农历正月（十三月）、十二月、十一月为岁首，如此循环，所以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史称“三正”。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⑤ 把三正与三统说联系起来，以建寅为黑统，建丑为白统，建子为赤统。^⑥ 后又有变异，以建寅为人统、建丑为地统、建子为天统。《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李贤注引张晏曰：“一曰天统，为周十一月建子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统，谓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统，谓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人始成立之端也。”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三正与三统相配的系统：



① 《礼记正义》卷四五《祭法》。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二端》。

③ 《史记》卷二六《历书》。

④ 《礼记正义》卷三四《大传》。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

⑥ 由于后来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并行，为加以融合，牺牲等用三统所尚之色，服色等应五德而设。正文中所引曹丕、曹睿父子的正朔、服色改易的诏书，有具体的体现。

因汉越秦承周，故汉以建寅为正。汉魏禅代，曹魏自然应以建丑为正，得白统（地统），故应牺牲用白。又根据汉末盛行的五德相生说，汉为火德，火生土，曹魏据土德。土应黄色，故服色应尚黄。照理来说，曹魏得白统与土德是明明白白，毋庸置疑之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曹魏改正朔、易服色并不顺利，其中有不少波折和徘徊。

曹丕登台受禅，告燎天地毕，遂制诏三公曰：“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① 非常迫切地召集群臣商议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至于应该如何改易，曹丕并非胸有成竹，故必须听取群臣意见。然而廷议的最终结果却是曹魏“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②。虽遵循了五德相生说，但却违背了三统循环说。曹丕之所以作出这样矛盾的决定，源于辛毗的意见。“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③ 辛毗认为只有汤武革命，以征伐定天下，才改正朔；尧舜禅让式的和平过渡，无需改之。且夏正得天时，与四时变迁和农业生产最为契合。依辛毗之意，魏既然继承了汉朝的天下也应当奉汉正朔（汉用夏正）。

曹丕虽然听从了辛毗的建议，但却没有直接作出“用夏正，而服色尚黄”的决定，而是虽用夏正（即建寅为正），却依旧对以建丑为正（白统）的初衷有所保留，故于黄初元年诏曰：

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④

其中“牲用白”即为白统的表现，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蛻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郊牲白。”^⑤ 但这又人为地制造了一个矛盾，既然不以建丑为正，又何必“牲用白”。正因为如此，尚书令桓阶等提出：“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⑥ 曹丕鉴于群臣所论，最终采取折中的办法，三正中取夏正，五德中取土德，形成了“用夏正，而服色尚黄”

①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②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

③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辛毗传》。

④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

⑥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

的方案。

顾颉刚先生说：“魏文帝（曹丕）短寿，还没等到改正朔，易服色就死去了。”^①对照以上所揭，不难发现顾氏所言实为疏误。事实是，曹丕积极改正朔，但碍于物议和为配合汉魏禅代的需要，未能成功，但服色尚黄已然定下来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方案，当时无论从政治形势，还是客观要求来看，正朔改革都必须继续推进。因为退居宾位的汉献帝在其山阳国内依旧“行汉正朔”^②；割据巴蜀的刘备以中兴汉室自命，亦沿袭汉正朔。换言之，从黄初元年曹丕称帝至景初元年魏明帝曹睿以建丑为正之前，山阳国、蜀汉、曹魏均以建寅为正，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曹睿初即帝位，独与侍中刘晔“语终日，众人侧听，既出”，晔对众臣评价主上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侔，才具微不及耳。”^③笔者发现，曹睿在锐意改正朔、易服色方面确与秦皇、汉武有相似之处。青龙五年正月，“山茌县言黄龙见”^④。黄龙是土德的象征，此时魏已受命十七载，“黄龙”再现，显然是曹睿准备要继承其父未竟的正朔改革使命，以昭维新。其实在正朔是革新还是袭旧（汉）的问题上，曹睿一直是主张革新的。“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曹睿）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⑤这次“黄龙见”，无疑给了他一个实现夙愿的机会。魏明帝令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等廷议，参加讨论的人很多，但仍然争执不下，达不成一致意见。侍中高堂隆对曹睿的想法心领神会，旋即上书曰：“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现，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⑥有司亦奏曰：“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⑦所奏正合曹睿之意，遂于是年三月下诏曰：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其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禘、祠、烝、尝，巡狩、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⑧

因原以建寅为正，即以正月为岁首，今以建丑为正，即以十二月为岁首，加之恰逢改

①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22章《曹丕的受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②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③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世语》。

④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⑤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⑥ 《资治通鉴》卷七三《魏纪五》景初元年正月壬辰。

⑦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⑧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

元，故“青龙五年春三月”就变成了“景初元年孟夏四月”。又按照白统，规定了“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朝会建大白之旗”。同时，服色尚黄是对土德的再次确认。但“建大赤之旗”又作何解？尚赤乃是周统的特征，何以混入其中？裴松之解读：“《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①即曹睿虽用建丑为正，奉殷礼，但也糅合了周礼。所以才有了“建大赤之旗”。至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孟夏四月，曹魏终于完成了改正朔的艰巨任务。

总之，改正朔是新王朝兴起的一件至关重要之事，因为改“正朔”不仅是改历法，而是一种对革故鼎新的信仰和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蕴藏在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中，也积淀在普通民众的心灵中。魏明帝乾纲独断，最终取得改正朔的成功，从这一点上看，比其父曹丕还要胜出一筹。

曹魏受禅后，除了对正朔、服色进行改易外，还正式确立以洛阳为京师。曹丕代汉后，以何地为魏朝京师有新的考虑。曹丕虽在许昌行禅让之礼，逼汉献帝逊位，但并不欲建都许昌。他虽下诏“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②，但曹魏的政治中心却定在洛阳。曹丕之所以作此决定，盖因东汉建都于洛阳已历二百余年，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已不可动摇。再则，历史上凡欲取天下者必争中原，争中原者必争河、洛，这已成了欲为正统王朝不可或缺的条件。诸葛亮北伐的目的在其前后《出师表》中讲得很清楚，“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③，故必须“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④。孙权虽建都于建业，但却对洛阳心向神往，想当中原王朝的君主。嘉禾元年（232）冬，吴国“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在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⑤所谓“郊祀当在土中”，指的就是郊祀须在河洛^⑥。甚至到了东吴末年，孙吴统治腐朽不堪，暴君孙皓还在做“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⑦的美梦。近水楼台先得月，洛阳在魏国境内，曹丕自然作了唯一不二的选择。

黄初元年十二月，曹丕下诏：“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⑧。又“欲徙冀州士家十

①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臣松之案。

②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③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④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⑤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⑥ 据《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传附子澄传》载，“（高祖）谓澄曰：‘河洛王里，因兹大据，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其中“伊洛中区”与“土中”之义同。又据《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载“洛邑自古之都……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贡赋等”系指四方向洛阳所输贡赋的路程距离大致相等。洛阳为“土中”之义更明。

⑦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

⑧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① 曹丕自邺城迁都于洛阳，其意无非是要昭示天下，大魏受禅，必须还于旧京，洛阳为天下之中，在此君临天下方为正统。然洛阳原名雒邑、雒阳。因汉以火德旺于雒阳，如不更其名，恐不利于以土德自居的曹魏。故曹丕“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变‘雒’为‘洛’。”^② 自曹丕始，雒阳才更名为洛阳。为了禅代更祚，以应五德，曹丕真是煞费苦心，动足了脑筋。曹氏据土德还不够，因“火忌水”，故还要把水德糅合到土德之中，可见曹丕受禅的复杂心态：他一方面要利用“五德相生说”，说明汉魏之间是相生关系，易代鼎革是和平禅让；另一方面又以“五德相胜说”中水克火的理念抵制汉代余荫的反扑，冀图永远扑灭炎汉这把燃烧了四百余年的大火。再者，改“雒”为“洛”，既有克汉之火德的打算，更主要的是要润魏之土德，即“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由此说明，这种以武力作后盾，魏革汉命的手段是完全不同于上古尧舜禅让的。

四

不容忽略的是，因曹丕通过法尧禅舜，隆而重之地完成禅让之礼，其声势之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割据巴蜀之地的刘备。^③ 曹丕代汉后，刘备立即蹑迹效尤，建帝号于岷峨。刘备自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④，又曾受汉献帝诛曹密诏，故立国颇显正义。刘备在蜀称帝，声称自己再次中兴汉朝。虽然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十一月，曹丕已代汉自立，建元黄初，但刘备不予承认，而是继续沿用建安纪年。其即位诏书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⑤ 其实，魏、蜀两国实质上都是自立的新政权，但由于身份不同，因此对汉朝的立场有异。曹魏以异姓易代，自然要制造禅代的理论依据，以证明本朝统治的合法，而蜀国的刘备以汉朝后代自居，则有必要证明火德之运依旧^⑥，并努力从各方面去寻找自己远绍汉绪的依据。

①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辛毗传》。

②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魏王登台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在交通不太发达的三国时期，匈奴单于、四夷皆能参加曹丕受禅告天仪式，可见其声势之大。

④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

⑤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

⑥ 在蜀地鼓动刘备称帝的舆论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议郎阳泉侯刘豹等人的劝进：“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讖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其中“赤三日德昌”即为火德昌。

如果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系外禅，那么汉献帝若能够禅位于刘备，就成了刘姓之间的内禅，岂非更能说明刘备继汉的合法性？但刘协已被曹丕囚于山阳，不可能再禅位给刘备。且刘备于登基前已制造了献帝被曹丕所弑的假象，并为之发丧，也不方便再堂而皇之地搞汉献帝已禅位于己的政治欺骗。那么刘备究竟有没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呢？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南朝陈虞荔所著《鼎录》中载“蜀先主章武二年于成都武担山埋一鼎，名曰‘受禅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①刘备铸鼎，名之为“受禅鼎”，且埋之于武担山，所为何来？笔者认为，备之“受禅”虽无曹丕受禅那样的逼真（无禅君，更无仪式），却也要亦步亦趋，学曹丕铸受禅鼎，显然他要受的是汉朝的法统。武担山是其告天即位之所，也是成都西北郊之处^②，刘备埋鼎于此，或许正是要告祈天地承认自己这另类的受禅。可惜，关于此事只有虞荔的这一条简单记载，不能窥其全貌。

其实，早在刘备建蜀汉政权前，曹魏内部已有人预料到汉家可以“季兴”。《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三辅决录》载：金祗等“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遂在许昌发动兵变。

蜀汉的“季汉”地位，在后世先后得到了匈奴族首领刘渊的肯定和东晋史家习凿齿的一度默认。西晋末年，天下纷扰，五胡乱华，匈奴刘渊于晋永兴元年（304）称汉王，下了一道颇有意思的诏令：“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③刘渊并不以为东汉皇统至汉献帝而告终，而是以蜀汉昭烈帝刘备继之，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④。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刘氏帝系：

孝愍皇帝（汉献帝刘协）→昭烈帝（刘备）→孝怀皇帝（刘禅）→汉王（刘渊）

从蜀炎兴元年（263）蜀汉政权灭亡到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自立，恰好四十一年，所以刘渊说“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刘渊不但奉汉，而且承认蜀汉的正统地位。当然，刘渊之意不过是为其自立而制造自己是汉家苗裔的社会舆论。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

① 《四库全书》卷一一五《子部》九《谱录类·鼎录》。

②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注引《蜀本纪》裴松之案“武担，山名，在成都西北，盖以乾位在西北，故（先主）就之以即阼。”

③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

④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

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①由此可知汉荫之深厚，刘备所建之蜀汉，虽未被陈寿所撰之《三国志》列为正统，但在时人心目中，却属于汉室内禅的类型，其皇统并未中断。即使在蜀汉灭亡后，冒称刘姓的匈奴族首领刘渊仍要打汉家招牌。

东晋史家习凿齿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史学命题，那就是晋应越魏继汉，像“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一样，否定曹魏的正统地位。其史学著作《汉晋春秋》的命名即生动地体现出这一观点。他临终上书朝廷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②习凿齿所主张的“承汉”是上继东汉，但笔者在阅读史籍中发现，习氏还曾默认过另一种以晋继汉的传承，那就是继蜀汉。详见习氏所著的另一部史书《襄阳记》：

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瓘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③

向充此言显然是蜀汉国祚当授于当时的魏中抚军司马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朝代传承顺序：东汉→蜀汉→晋。刘备在蜀建立政权，并称作是汉朝的再次中兴，这样的朝代传承顺序倒也有几分道理。但习凿齿为何最终主张东汉→晋的模式而否定了《襄阳记》中的说法呢？这说明习氏的思想在不断地深化和升华，既然连曹魏尚不足宗，更何况是偏据西蜀的蜀汉呢？实际上习氏最终是否定了整个三国时代^④，而将晋朝直接嫁接到汉朝身上。清人何焯认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的这条记述实际上是其“《汉晋春秋》之所由作也”^⑤，笔者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其实向充所说的“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之谶，并非是谯周所造，而是谯周受之于杜琼。蜀汉景耀五年（262），谯周见宫中大树无故自折，以为不祥，遂依杜琼所言而推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解释道：“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⑥但汉献帝早已禅位于魏文帝，蜀

①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同篇又载：“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所以，刘渊称自己为“汉氏之甥”。

② 《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

③ 《三国志》卷四一《蜀书·向朗传附向充传》注引《襄阳记》。

④ 《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载，习氏临终上疏曰：“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可见，习氏最终不认同三家中的任何一家为“正朔”。

⑤ 《三国志集解》卷四一《向朗传附向充传》注引《襄阳记》集何焯曰。

⑥ 《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琼传》。

汉要禅位也无从禅起。合理的解释莫过于谯周等人对蜀汉的前途毫无信心，认为只能为魏国所并，“具而授”不过是不要在强敌面前垂死挣扎，以免殃及苍生，所以后来谯周力劝后主刘禅主动投降。在劝刘禅投降的说辞中，谯周仍然以尧舜禹相禅的典故，为其分析利害：“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①把投降说得冠冕堂皇，似乎有了禅让的味道。谯周之所以坚决地劝刘禅投降，或可能认为汉朝的主流经汉献帝早已“禅让”给曹魏，作为支流的蜀汉在国力衰弱、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将国家授于魏也是讖语早已预言的历史方向。

虽然向充的解释、谯周的说辞都没有为后人所接受，晋采取和最终认同的也是东汉→曹魏→晋的朝代传承顺序。但可以肯定的是，流传于蜀汉的这些有关禅让的讖言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晋完成三国的统一。清人刘咸炘认为：“（谯周）故以汉数当亡而劝降。承祚师谯周，俱载其讖语，直至常道，将津津言周之讖。蜀之不能申大意者，以图讖也。”^②笔者很同意这一意见。

余论

从形式上看，汉魏鼎革在曹丕受禅之时业已告成，但实际上，包括改正朔、易服色、祖虞舜以及郊祀礼制改革等都要在曹睿时代才相继完成。所以，曹魏代汉是一个经过祖孙三代人的不断经营、不懈努力的政治文化工程。虽然旧史家将汉魏禅代视为曹丕篡位而不屑，但曹魏代汉却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在汉失其鹿、易代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汉魏禅代仅仅以汉朝帝王一姓一族权力的终结——这种古代社会的最低成本，来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将杀戮降低到最低点，比之“血流漂杵”、“伏尸百万”，总要强过数倍。以效法尧舜授受、君位让贤的形式进行礼仪化、正统化包装的曹魏代汉，最终解决了封建皇权专制时代，权臣如何易代鼎革的难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曹魏统治者出身寒族，未能推行儒术，所以无法得到世家大族的真心拥戴。东汉以治经起家的高门世宦自诩为“清流”，视其他士人为“浊流”，因曹操祖父曹腾是东汉桓帝的中常侍，故曹操属于浊流，被以袁绍为代表的世宦大族斥之为“赘阉遗丑”。尽管曹操、曹丕、曹睿父子孜孜经营曹魏政权，但曹氏家族的宦官出身仍是他们无法摆脱的阴影。在重门第、讲血统的时代，他们虽贵为皇族，却为衣冠望族所不齿。陈寅恪先生在分析魏晋禅代时说：“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氏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

^① 《三国志》卷四二《蜀书·谯周传》。

^② 《三国志集解》卷四二《杜琼传》集刘咸炘曰。

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① 其次，曹魏国祚短促，代汉后的两代帝王曹丕与曹睿，虽不失为雄略之主，但皆享国短浅，寿不永年，继续的三少帝皆为幼主，不仅不能理政，反成为权臣掌控的傀儡，故很难将魏的正统化运作深入下去。再者，曹魏虽统一北方，却始终难以打破与吴蜀的鼎立局面，无法结束自汉末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状况，如此亦就很难论证天命所归，结果其统一四海之使命不得不由司马氏完成。所谓“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②，所以，尽管曹氏对其政权的合法化、正统化运作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但其成效始终有限，不能像“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③那样深入人心。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曹魏政权的正统化最终事倍功半，其社稷亦轻易地被司马氏所取代。纵然如此，曹魏代汉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代，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为后世踵袭和完善。^④

本文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以及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B. 10-0102-07-005）的资助。拙文在完稿过程中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朱子彦，1949年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光乾，1979年生，中国科举博物馆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2010年1月28日

① 陈寅恪：《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见《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页。

② 《汉晋春秋辑本》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

③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

④ 《廿二史札记》卷七“禅代”条云：“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